



下卷

王洪伟 著

钧窑通史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下
卷

王洪伟
著

钩宋通史

王洪伟题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第三编



本编囊括第十、十一、十二章。本编集中叙述钧窑在中原的颍河、汝河流域南北方以及在中国之外的发展演化：第十章叙述北方钧窑系发展史，从而探究北方钧窑系的形成路径及历史特征；第十一章叙述南方钧窑系的历史发展线索和工艺美学特征；第十二章集中探究钧釉工艺美术在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国外的发展，侧重介绍台湾钧釉发展及其创新面貌。由此编所见，古代钧窑系的空间扩张主要依赖于钧窑匠师的流动迁徙，南北钧窑系的形成内在机杼全在乎此；随着传统钧瓷技艺为现代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关注和钻研，大量钧釉科技分析数据的公开和原产地钧窑烧造经验的文本化公布，更借重现代网络传播方式，钧窑系的概念逐渐被钧釉系的概念所取代，发自中原的钧窑工艺技术呈现出向全球弥漫的迹象。较之于第二编侧重原产地钧窑的历时态纵向演化，本编侧重于研究钧窑文明的空间性的横向历史拓张。

第十章

北方钧窑系



宋金元时期，中原战争频繁，钧瓷技艺随工匠迁徙开始自原产地颍汝之间向环嵩地域传播，尤其在金元时期，随着战争波及，沿太行山东西麓尤其是东麓北传及河北、山西、内蒙古甚至更北部，形成庞大的北方钧窑系。

位居华夏文明核心地带的颍汝流域是钧瓷的创烧产区，本章首先关注钧瓷创烧的核心地带——禹州钧窑系，这里可能不仅是钧瓷的始烧地，「钧瓷」命名的起源地，而且也是「官钧」的烧造地，后世文献长时间所云的「钧瓷」「钧窑」，早期即指陈设类「官钧」，晚清之后才将器皿类民用铁系青蓝釉钧瓷囊括进来；在此基础上，进而探索性研究颍汝钧窑系，首先记述颍河上游登封窑的钧瓷历史烧造情况，附带涉及密县窑。其次侧重梳理描述汝河流域的郟县、宝丰、汝州及鲁山等地的钧瓷历史烧造路线。实际上，早期烧造钧瓷质地极佳的禹州的神垭西部刘庄窑、下白峪窑和磨街东部尚沟窑等都属于汝河流域，只是基于后来行政区划的分割而在禹州窑系中先期介绍，也从一个侧面诠释了颍汝钧窑系的一体性。

在此基础上，本章进而梳理环绕嵩山山系的河南郑州、洛阳、南阳地区的钧窑系时空演化，并进一步扩及太行山系东西麓自南向向北的钧窑系流变，由此探究自颍汝河流域发起的钧瓷烧造技艺在河北、山西、北京、内蒙古等北方钧窑系历史演化路线及其历史特征。



第一节 禹州钧窑系

鉴于禹州城区钧台窑作为“官钧”烧造地已在其他章节做过详细介绍，本部分侧重介绍禹州辖区历史上民用窑场钧瓷烧造的历史境况。

在历史文献中，河南禹州是钧瓷的故乡或原产地，这一观点为后世学者广泛援引^①。但外来学者在寻找“官钧”烧造地的时候常常到禹州下辖的神垭辖区去寻觅——尽管明清时期钧台窑断断续续一直在烧造，但是古代钧瓷烧造技艺有所断裂。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失传的钧瓷技艺在禹县神垭一镇恢复性研制，钧窑系其他地方的钧瓷烧制基本绝烧，曾经发起于颍汝之间的钧瓷原产地萎缩到神垭一镇。不过笔者认为，历史文献关于“钧窑”原产地的描述基本是关于“官钧”产地的说辞，而非钧瓷原产地。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南窑笔记》曾提到：“均窑，北宋均州所造……”^②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云：“均窑，宋初禹州所烧造。禹州昔号钧台，钧讹作均，相沿已久。”^③郭葆昌《瓷器概说》云：“……钧窑建于宋初，在今河南禹县，其地有钧台，因名钧窑，至今尚存。”指代的都是“官钧”烧造地而非指钧瓷故乡或原产地的问题。^④

20世纪50年代以降，以北京学者陈万里、冯先铭、叶喆民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到神垭古窑址寻找“官钧”烧造的遗存，所获不大；但神垭古钧窑址的调查则初步确定，钧瓷可能早在北宋中期就开始烧造，北宋及金代钧瓷质地相对较好，延及元

① 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61页。

② 转引自高代英主编、何新所辑注：《钧瓷历史文献辑注》，学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42页。

③ 同②，第104页。

④ 同②，第136页。

代质量大大下降。^①

1964年,禹州地方政府组织的一次全县范围的钧瓷史调查,对于辖区范围的古钧窑址最为系统全面。1982年4月,为了解禹县古钧窑址的全貌、民窑与官窑的关系,其时供职于禹县钧瓷一厂的晋佩章等在禹县钧瓷工业公司的提议下曾对一些重点遗址进行了复查,并根据两次调查获得的实物资料,明确和划分了县域古钧窑址的时代和分布区域。晋佩章等分析认为,就96处古钧窑址而言,北宋早期10处,北宋中晚期25处,金元时期61处,大部分密集分布在县域西部山区。时代是南早北晚,规模南大北小,产品品种南繁北简,产品质量南优北劣。随着时代的推移,窑业生产由南向北逐步发展。通过对古代窑址大量标本的收集和对比,证明宋早期钧瓷工艺技术全面、产品最精良的烧造区是刘庄窑,其为后来庞大的钧窑系奠定了技术基础,是后起之秀“钧台窑”的摇篮。钧台窑窑变铜红釉的烧造成功,在当时各大名窑中独树一帜。一般人所通称的“宋钧民窑”或“宋民钧”是指以神垕为中心、刘庄窑为代表的那种釉质莹润天青色的民用器形。“宋官钧窑”或“宋官钧”则是指县城内钧台窑所烧造的大多通体紫红色、有些器底刻有数目字的贡瓷器物。^②

表 3-10-1 禹县古钧窑址历史分布一览表

窑址 时期	晋佩章总结的数据	曹子元总结的数据 (共 117 处, 余 40 处无法确定年代)
唐代		赵家门、苕庄、玩花台、老观崖 4 处
北宋早期	红石桥(神垕镇区)、长春观(神垕镇区)、刘庄、苗家门、鸿畅、下白峪、槐树湾、杨岭寨、刘家沟等 10 处	红石桥、长春观、刘庄、苗家门(上白峪)、鸿畅、下白峪(笼盘地)、槐树湾、杨岭寨、刘家沟、张庄(上白峪)、刘家门、鸿畅等 15 处
北宋中晚期和钧台窑同期	钧台窑、五龙泉、花石、王桥、大涧、王家门、闵庄、吴庄、黄庄、神林店、接官亭、石峪、西寺(神垕镇区)、华沟、霍垌、石圪节、铁炉沟、扒村、桃园、郭寨、赵家洼、邓禹寨、方山、磨街、西刘村共 25 处	40 处

① 冯光铭:《有关钧窑诸问题》,《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叶喆民:《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文物》,1964年第8期;李辉柄:《钧窑系的形成与分期》,载《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② 1982年4月神垕钧瓷工业公司提议复查窑址。参见田松山、晋佩章:《从禹县九十六处古钧窑遗址的调查浅谈钧台窑的艺术成就》,《景德镇陶瓷》,1984年总第26期,第177~188页。

(续表)

金元时期	白沙(大坝西)、党寨、夏庄、吴庄南、西炉、车沟、靳沟、神林店东、蜂王沟、杨庄、东炉、官山、文湾、白家门、倒碑、孙庄、南垌、侯家门、康沟、井沟、郡王沟、沈垌、樊沟、杏山坡观音堂、尚沟、柴垌、三古垌、陈园、东柳村、邵家门、官寺、吴湾、下官寺、青石潭、九空窑、磨河、下磨河、杨河、张寨、耿窑、许屯好汉坡、砖桥、孟湾、贾湾、李袖、垌沟、浅井、文殊、缸瓷窑、夫子庙、长庄(应为茺庄)、后坡、褚河、黑沟、方岗、麻地川、梁桥、西寨(神垕镇区)等共 61 处	58 处(其实在神垕镇区宋金元时期的钧瓷窑址星罗棋布,但由于位于镇区,大都 被毁坏。2013 年位于地方国营禹州市瓷 厂正门在建的建业钧都新天地发现规模 浩大的金元钧窑址,正式考古发掘后被 选为河南省 2013 年五大考古发现—— 笔者注)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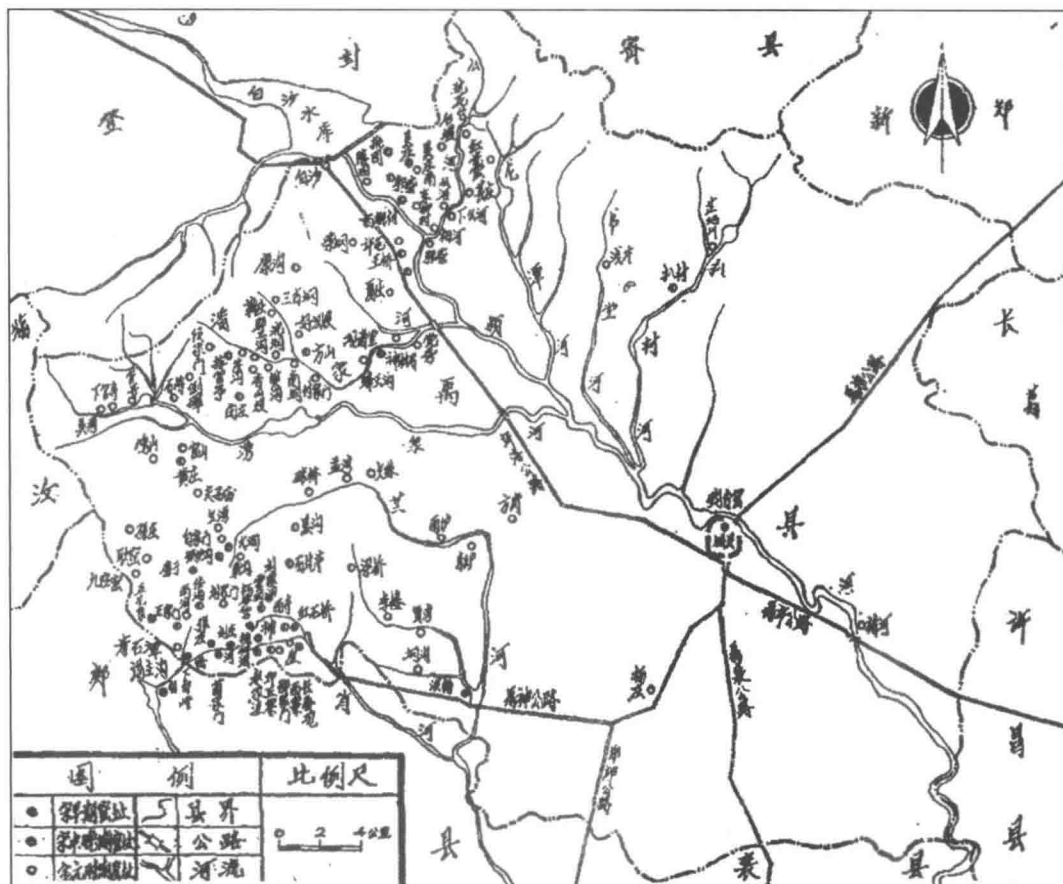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从禹县九十六处古钧窑遗址的调查浅谈钧台窑的艺术成就》,田松山、晋佩章著,《景德镇陶瓷》1984 年总第 26 期,第 177~188 页;《禹县古瓷窑址分布考察纪实》,曹子元著,《禹县文史资料》(第三辑)2007 年重印本,第 59~97 页。特别说明,这里关于禹州范围古窑址的年代定性,只是调查者依据自身历史知识和陶瓷知识的见解的初级推断,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所以并非最终的科学结论;但这种调查,能大致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禹州地区古钧窑址或古窑址的概况。

晋佩章等进一步分析说,这 96 处窑址除少数分布在平原外,大多都密集分布在县区西部山区,依山靠水建在蓝河上游,涌泉河、白峪河、磨河、潘家河、肖河两岸。这里陶瓷资源丰富,煤、柴等燃料可以就地取材,有丰富的水资源,生产陶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各个窑场分布看,随着时代的推移,窑业生产由南向北逐步发展。宋早期窑场分布在神垕镇附近,在整个县城的西南部沿白峪河两岸密集分布。北宋中晚期 25 个窑场分布在西部山区。这些窑场都是在钧台窑的盛名影响下互相竞争、遍地开花的民窑。从采集的实物标本看,禹州钧瓷一直生产到元代末期,甚至到明代末期个别窑场还在烧造。晋氏形象地描述说,数量较多的元代窑场围绕在河流周围,景象十分壮观;若鸟瞰整个窑场与河流的格局,甚似一颗枝茎茂盛、果实累累的巨大花生果拔出地面、平放在绿色地毯上一样,令人称绝叫奇。

不过,在 1964 年的调查中,全县共发现窑址 96 处,但能列出地名村名者仅 87 处,而且并未注重标本的采集和保存,且少量的标本也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丢失。1980 年冬季和 1981 年春季、冬季,禹县文管会、文化馆以馆长曹子元^①牵头复查全县古钧窑址,新发现 15 处,全县共发现古瓷窑址 111 处,其中能列出村名、方位者为 102 处,并采集了一些瓷片和窑具等标本。按照曹子元的统计,截止 1984 年 12 月,全县 22 个乡镇,有古窑址的乡镇 15 个,共发现窑址 156 处。其中 12 个山岗乡镇有窑址 153 处,平原地区只有 3 个乡镇,只有窑址 3 处。古窑址绝

^① 曹子元(1928 年—),学名应乾,河南省禹州市人,曾任禹县文化馆馆长、河南省考古学会会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1953 年后尤其 1976 年后在钧瓷窑址调查上大有作为。

图 3-10-1 20 世纪 80 年代调查绘制的禹县古窑址分布图



资料来源：《从禹县九十六处古钧窑遗址的调查浅谈钧台窑的艺术成就》，田松山、晋佩章著，《景德镇陶瓷》，1984 年总第 26 期，第 177～188 页。

大部分分布在县西南、西部、西北部和北部山区。那里古代有森林、煤矿、瓷土，分布在颍汝两河及其支流蓝河、涌泉河、白峪河、潘家河、肖河、磨河、谷水河两岸。曹子元进一步分析说，这些窑址的年代分布如下：唐代4处，北宋早期15处，北宋中晚期40处，金元时期58处，共计117处，其余40处因遗存较少、范围较小，未能确定年代；而且117处中由于未全部发掘，可能年代上未必完全准确。^①

表 3-10-2 禹州市古钧窑址空间分布一览表

窑址 乡镇	1964 年发现窑址 (调查时 96 处,能列出名字的 87 处)	1980 年冬季和 1981 年 春季、冬季新发现窑址	1984 年 12 月底新发 现窑址(共 156 处)
神垕(山区)	清石潭、下白峪、张庄(上白峪)、苗家门、茶叶沟、刘庄、赵家洼、槐树湾、二道街、长春观、刘家沟、石圪尖、梁桥、杨岭寨、刘家门、关帝庙、侯家沟、瓦窑沟	赵家门(唐代)	西寨、红石桥、西寺、邵家门、邓禹寨、霍垌(共 25 处)
磨街(山区)	杨家门、尚沟、五龙泉、九空窑、耿窑、磨街、侯沟、青石潭、大涧、文湾、马垌、王家门、陈庄	户阳、关庙、后庄、石板段、温沟、刘门、水闸湾、碗莊湾、大石板沟	花沟、铁炉沟、白家门、孙庄、康沟、合沟(共 28 处)
鸠山(山区)	大潭沟、瓦窑沟、黄庄、吴庄、范门、唐庄、吴河、石峪、官寺、下官寺、闵庄、父子庙	崔家庄、白龙湾、南崖、白龙潭、李村	官山、鸠山、吴湾(共 20 处)
方山(山区)	方山、好汉坡、三古垌、倒碑、靳家门、郡王沟、接官亭、井沟、侯家门、祖师庙	/	(共 16 处)
花石(山区)	神林店、观音堂、花石、夏庄、山张、老范沟、冯家门、柴垌、庙垌、罗义沟、周家门、白沙、王桥、东柳村、西郭村、桃园、郭寨	/	张寨、蜂王湾、陈园、许屯、吴庄、吴庄南(共 23 处)
裴庄(山区)	裴庄、玩花台、落雁坪、党沟	/	下么河、杨河、杨圪塔、小杨圪塔、么河、后坡、李沟、缸瓷窑、老观崖(共 13 处)
浅井(山区)	扒村	/	麻地川、浅井(共 3 处)
文殊(山区)	薛河、坡街	/	文殊、孟湾、砖桥、黑沟(共 6 处)
顺店(岗区)	尹岗、党寨	/	(共 2 处)
张得(岗区)	杨庄、王集	/	(共 2 处)
方岗(岗区)	西炉、东炉、方岗	/	(共 3 处)

① 曹子元：《禹县古瓷窑址分布考察纪实》，《禹县文史资料》（第3辑）2007年重印本，第59～97页。

(续表)

鸿昌(岗区)	鸿昌	/	垌沟、贾湾、李楼(共4处)
火龙(平原)	龙池	/	(共1处)
褚河(平原)		/	褚河(共1处)
城关(平原)	钧台窑	/	(共1处)

资料来源:《禹县古瓷窑址分布考察纪实》,曹子元著,《禹县文史资料》(第3辑),2007年重印本,第59~97页。这里同样要特别说明,关于禹州范围古窑址的年代定性,只是调查者依据自身历史知识和陶瓷知识的见解的初步推断,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所以并非最终的科学结论;而且,由于这种调查是地方文化主管部门的非专业调查,因此在窑址的命名上显得比较随意和混乱。但正是这些早期比较系统的古窑址调查,使在历经农村和城市建设后,后来者仍能大致观察到历史上禹州各个时期和地理空间上钧釉瓷窑烧制概况。

曹子元认为,从已发现的156处窑址看,禹县钧瓷以神垕为中心,从神垕向全县发展,进而影响黄河南北及我国南方的一些窑口。当时的钧瓷窑业基本是以家主体(户)为生产单位,主要分布在山区,神垕镇处于全县窑址分布区的南部,钧瓷由南向北发展:时代上南早北晚;规模上南大北小;质量上南优北劣;产品种类上南繁北简;质量上神垕产品最精、钧台窑工艺为诸窑之冠。^①

据晋佩章、曹子元等所述,在禹州以神垕为代表的古窑址中,北宋早期质地最精良的窑口当为上白峪的刘庄窑。刘庄窑烧造的钧瓷造型规整、釉质细润,釉色多以天青为主,也有月白、天蓝、葱青、米黄及带红紫斑的产品。施釉厚薄得当,所见瓷片流釉、粘足的极少。盘、碗、碟之类器物大多均施满釉,甚至施过足釉,足上多涂褐色护胎薄汁。胎质细密坚固,呈灰黑色,因而能达到胎薄釉浓、葱青肥厚、光彩夺目的程度。精良的上等品多为一钵一器采用支钉架烧而成;罗汉碗、双系罐等少数品种擦烧和套烧。刘庄窑时间早、工艺精、品种多、水平高,应该是钧台窑“官钧”的前驱。^②北宋中晚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窑场是钧台窑;其次为神垕西北、距镇区10千米的大涧窑场,此处窑场坐落在蓝河发源地,窑炉分布不太集中,但分工极细;从现场发现情况看,沟外建窑烧素胎、沟内建窑烧釉烧。蓝河沿河窑场,多生产鸡心碗、口汤碗、折沿盘、双系罐、炉、洗等民用器物造型;釉色天蓝、月白居多,天青极少,带红紫斑的残片并不罕见;胎质致密、釉色莹润、彩斑瑰丽,大部分器物满釉垂足,内外施半截釉的产品制作也比较精细。调查中发现这里有作

① 曹子元:《禹县古瓷窑址分布考察纪实》,《禹县文史资料》(第3辑),2007年重印本,第67页。

② 田松山、晋佩章:《从禹县九十六处古钧窑遗址的调查浅谈钧台窑的艺术成就》,《景德镇陶瓷》,1984年总第26期,第177~188页。

坊、窑场、货场乃至销售店房，可见当时生产的盛况。金、元时期的窑场在禹县西部山区到处皆有，规模较大的是白沙吴庄南。这里的产品胎质粗糙泛黄，工艺要求极不严格，轮制产品不规整，盘、碗、碟、罐的圈足都旋为直足；釉色天蓝、月白，施釉不均匀。所采集到的标本釉层有厚有薄，厚的则肥过度，釉流下垂处聚釉达到了“垂若蜡泪”的程度；薄釉露底则可看到胎上的轮指和刀痕，釉质较粗，烧成后多有气泡和棕眼。这里烧造的钧瓷器物多大件，器外多施半截釉，内心露胎；变形多、废品率高，有可能是采用一次烧成。搜集的标本器形，有大、小不同的碗、盘、罐和和面盆等。元代产品品种单一，质量较次，但烧造的窑场却很多。

李辉柄经过实地考察也认为，刘庄窑烧制的器物，除了造型不同外，胎质、釉色以及精工程度都与“官钧”比较接近。李辉柄援引当地老艺人的回忆说，刘庄曾出土过带号码字的钧瓷瓷片，只有一、三、五、七、九，并无双号；并认为在钧台窑烧造“官钧”前，有官方曾在刘庄民窑烧制过贡瓷的可能性。^① 1973年—1986年、2004年，位于禹州城区的钧台窑数度被正式考古发掘，一度被认定为北宋末年为皇宫烧造“官钧”的官窑。此说后来受到很大争议，此处不赘述。

200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钧窑的中心窑场之一——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钧窑址进行主动发掘。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代窑址是成组分布的一个瓷窑组群。在大刘山下，沿白峪河旁分布，每隔1千米左右就有一个窑址，各窑址一般范围不大，遗存的时代也比较单一。从早到晚延烧的窑址并不多。发掘报告认为：首先，通过发掘大体可以确认在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11世纪末至12世纪前半叶）。这一时期钧釉瓷器已经产生，主要生产小件器物，但制作精良、规整，部分产品采用了裹足支烧的方法，底部留下了细小的支钉痕迹。这种工艺与北宋晚期北方地区，尤其是河南中西部地区诸多窑场流行的生产工艺相同。器物的品种也十分丰富，有碗、盘、钵、盒、注壶、盏托、香炉、连座瓶、盆，等等。特别是菱口大碗、海棠式长盘等，造型优美，制作精致。这个时期钧釉器物的釉层较薄，釉的流动性不强，釉色淡雅匀净，釉薄处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但这时带红彩的器物极少见，少数器物上有大片的红彩，红色几乎布满器表，红色较淡，而且与天青釉极好地交融。此期还发现了内施天青釉，外施紫红釉的器物，覆盖外壁的紫红釉颜色秀美娇艳，比传世的陈设类钧瓷外壁的紫红釉显得浅淡而艳丽。此期的产品组合中以青瓷器为主，数量占到60%左右，而钧釉瓷器只占少

^① 李辉柄：《钧窑系的形成与分期》，《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数,此外还有少量白瓷和黑瓷。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钧窑以制作精良和素雅的风格见长。其次,经过对刘庄窑址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可将钧窑的发展历史分为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金代后期到元代初年和元代时期3个时期。从金代后期开始,钧瓷生产开始走向粗糙,尽管器类并无大的变化,但海棠式长盘和内天青外紫红釉的器物已不再生产,大多数器物不再施满釉,器物的圈足内也不再施釉,器壁变厚,器形开始趋大。带有印花的菱口大碗和无耳的精美小香炉是本期极有代表性的产品。器物表面开始施加红彩,但红彩变成小块而规整,应是在天青釉之上特意加施的含铜彩料。神垕镇的诸窑场中仍以青瓷为多,钧釉次之,白瓷的数量增加,而开始较多地出现白地黑花瓷器,此外还有少量红绿彩瓷等。总体上仍以精细、典雅的风格为其主要特征。到了元代,钧窑的生产十分繁盛,沿白峪河一线普遍生产,器物大而厚重,主要器物有碗、盘、瓶、罐、香炉、盆、枕等。其中带贴塑的花口连座瓶、贴花大香炉、梅瓶和四系瓶等十分有特点。钧釉器物的釉层开始变厚,釉的流动性较强,各种釉色的变化以此期最丰富,月白色釉开始较多地出现,此外还有紫蓝色、褐绿色等釉,一件器物上不同部位也会因釉层的厚薄或烧成原因而呈现多种色彩。不再见施满釉的器物,带红斑器物进一步增多了。从整体上看,器物厚重而不失美艳。此时另一大特点是白地黑花瓷大量出现,黑瓷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而且,可能由于钧釉特定的烧成温度区间、气氛等原因,与其一同烧制的黑釉瓷很多都带有密布的油滴结晶。总体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以上三个时期大体覆盖了钧窑发生、发展、繁荣的历史发展过程,为研究钧窑本身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①考古发掘者同时也对唐中晚时期的下白峪窑址进行正式发掘,认为在下白峪窑址未发现接续生产的宋元时期的遗存,未发现唐代的地层与宋代的地层间有连续生产的迹象。在神垕镇西南部也未见明确的北宋早中期的遗存。这表明,整个这一地区的窑业生产在晚唐以后曾有长时间的停顿。因此,尽管有些花瓷斑片的呈色与钧釉瓷,尤其是元代的钧釉瓷十分相似,但将唐代的黑釉花瓷与晚期的钧釉瓷直接联系起来,仍显过于牵强。^②

另外,2011年9月—12月,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建立对钧窑不同时期产品特点的认识及其发展序列,特别是了解明代初年钧窑的生产面貌,并探讨钧窑民窑生产和官窑生产的关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联合组队

①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钧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1期,第26~52页。

② 同①,第15~36页。

对河南省禹州市鸠山镇闵庄钧窑遗址进行了主动考古发掘。闵庄窑址位于禹州市鸠山镇东北部，地处禹州、汝州、登封交界地区，属伏牛山余脉箕山山间岗地，平均海拔 300 米左右。附近区域蕴藏着丰富的煤、高岭土、耐火黏土、铝矾土等矿藏资源。窑址的主体部分东西长约 400 米，南北宽约 200 米，面积约 8 万平方米。此窑址于 1964 年经调查发现，由于历年来的农田改造和村庄的房屋建造，窑址已受到较大的破坏。2007 年在修建村际公路时窑址遭到破坏，出土了许多器物，其中有一些制作精良、胎体较厚，与钧官窑的花器风格相似，与 2004 年在禹州发掘的制药厂遗址晚期地层的出土物相似；还出土了少量花器的残件。通过发掘和对一个小区的初步整理，考古者发现并清理了从北宋后期到明代初年的地层堆积及出土物，推测闵庄窑址的生产大体分为四个大的时期^①：第一阶段为北宋晚期，是此处窑场生产的滥觞期，以生产白瓷为主，产品种类比较单一，以碗、盘类器物为主。特点是器物的釉色比较莹润，一般施两层化妆土，通体施一层薄的化妆土，少量器物还带有白釉绿彩装饰。第二阶段为北宋末到金代早中期，是该窑场生产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地层中出土较多精美的钧釉和青釉器物。钧窑器物制作规整，造型优美，釉层较薄，釉色淡雅，匀净润泽；青釉器物一般釉质明丽，玻璃质感较强，两类器物多采用裹足支烧或裹足刮釉的装烧方法；与以往在禹州神垕刘庄窑址发掘的第一期地层出土的器物十分相似。这时期也是禹州境内窑业的一个发展时期，一些重要的窑场开始生产钧釉瓷器。第三阶段为金代后期到元代，此处窑场进入以白瓷为主的生产阶段，器形单调，制作比较粗糙。特点是器物的釉层较薄，显得干涩，施釉不到底，这个时期正是神垕地区钧釉瓷器生产的发展时期，但在不远的鸠山却又开始以生产白瓷的碗、盘为主。第四阶段，元末明初，是闵庄窑址真正繁荣的阶段。产品以钧釉瓷器为主，还有少量白地黑花瓷器，部分制品质量很高。这一阶段，钧釉瓷器的生产从十分粗糙，釉的流动性很强，釉色不匀，再次变得精致而规整，釉色匀净光润。这一闵庄窑最丰富的地层中以钧瓷为主，伴随出土有白地黑花瓷片。特别是该地层中还出土少量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片，发掘者推断该地层的年代可以确定为明代初期。闵庄窑这个时期的钧釉瓷器从制作粗率变为精细规整，部分产品质量较高，器物厚重而规整，釉层较厚，匀净而光艳，还出土了一些内壁施天青釉，外壁满施紫红色釉的瓷片，与钧官窑花器的特点十分相似。由此，考古者推测闵庄遗址钧瓷的生产延续到了明初，在元末明初时是重要的钧窑民窑生产地。其在一些重要的工艺技术上与钧官窑不相上下，表明当时钧州窑业生产总体水平都是比较高。

^① 秦大树、赵文军、徐华烽：《河南禹州闵庄钧窑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2 年 3 月 2 日第 8 版。

2013年,神垕镇区国营瓷厂南墙一带的金元古窑群的发掘已如前述。总之,从20世纪60年代古陶瓷学者在禹州辖区及周边地区的古窑址田野调查,1973年至2013年禹州辖区的古窑址考古发掘,为探索禹州钧窑历史发展序列和地理空间分布,积累了很多有效的历史素材。尽管学术界对这些调查、发掘的解释千差万别,但都有助于更客观地逼近钧窑发展史的实际,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尽管考古学依赖地层分析和类型分析,为钧窑史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素材,但是对素材的整理和分析还存在很多不足。以禹州民窑的几次发掘所见,首先,在下白峪中晚唐花瓷遗址发掘中,考古者因为未曾发现宋代地层、唐代地层的连续态,也未发现接续生产的宋元时期的遗存,就武断地断定神垕西南部也未见明确的北宋早中期的遗存;武断地推断整个地区的窑业生产在晚唐以后曾有长时间的停顿。这样一来,不仅犯了“以点概面”的常识性错误;而且考古者主观地认定古代窑场废弃瓷器都会照着一个坑一层层地填埋,由此断层断代,显然有失科学水准。实际上,可能有更多的古窑址反证来推倒这些基于考古类型学说和地层学说所得出的历史结论。其次,钧台窑、刘庄窑、闵庄窑及神垕诸古窑址的考古发掘分析,也大都带有“以点概面”的逻辑推演思路。更为重要的是,在发掘过程中,考古者在刘庄窑北宋晚期地层发现了内施天青釉,外施紫红釉的器物,覆盖外壁的紫红釉颜色秀美娇艳,比传世的陈设类钧瓷外壁的紫红釉显得浅淡而艳丽。发掘者认为,这种内外两种釉的施釉方式与传世的大量陈设类瓷器基本相同,应该说其开钧窑陈设类瓷器制作工艺之先。而在闵庄窑址真正繁荣的元末到明初地层也出土了一些内壁施天青釉,外壁满施紫红色釉的瓷片,与钧官窑花器的特点十分相似。由此,发掘者推断,刘庄窑、闵庄窑都为禹州钧台窑“官钧”烧制提供的工艺基础,而非闵庄窑的疑似花器是受了北宋末年钧台窑“官钧”工艺的影响,由以禹州钧台窑的“官钧”烧造晚至刘庄窑、闵庄窑之后的明代早中期。这种学术推断显然过于勉强,值得商榷。

总之,经过数十年的禹州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大致可以建构起禹州钧窑文明史演化的一般性历史框架:北宋末期,禹州钧窑始烧于以神垕为核心的西南山区,经金元时期形成遍布全区的禹州钧窑系框架,并沿颍河、汝河及环嵩山地区技艺传布,顺而沿着太行山东麓北上,出河南,入河北、北京及内蒙古等窑场;元代之后,又转向传布到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南方窑口,形成遍布大江南北的庞大的钧窑系。明清时期,禹州范围的钧瓷烧造渐趋衰败(此依“官钧北宋说”的历史观;若以“官钧明代说”的逻辑,“官钧”烧造于明代早期,而明代民窑或因受到当时政策制度的影响,烧造不盛乃至停烧)。清代早中期尤其雍正时期,景德镇等南方窑场仿烧钧釉,而且一直延续到晚清。到晚清民国时期,北方北宋、金、元时期形成的钧瓷烧制技艺几近断续,神垕地区的“大火蓝”“卢钧”或“炉钧”都是